

文化“两创”践行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融媒系列报道

儒苑青陶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薛琦

守正创新，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命”

汪泷 济宁报道

青陶，听起来似乎是个小众的名词。但如若说起古建筑金瓦红墙下的巨石青砖，相信多数人便觉得并不陌生。如今在建筑行业已几乎难见青砖灰瓦，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薛琦却用传统烧制技艺创作出更加适合当代人生活的青陶制品，为这门“老手艺”寻到了“新出路”。

钻研16年

传承千年技艺

走进位于洸河路一栋写字楼内的儒苑青陶工作室，放眼望去，是各式各样的青灰色的茶台、壶承。作为这座工坊的主人，薛琦每天都能从“犄角旮旯”里找到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块壶承摆放的角度不够好，墙面悬挂的关于技艺的布画还差点美感……见到薛琦的时候，他仿佛在悉心照料自己的孩子一般，轻轻摆放着几块刚刚烧制完成的干泡茶台。

“这几块是新产品，最近我正在构思，想要把更多与济宁有关的历史文化元素融入进来，创作一些独属于咱们济宁的文创产品。”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陶器烧制技艺(儒苑青陶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薛琦介绍，青陶最早成功出窑的时候，受制于技术的局限，他一直只制作“百家姓氏伴手礼”等两个系列。而随着近几年烧制技艺逐渐成熟、稳定之后，他创作出的壶承和茶台种类也越来越多，无论是纹饰还是文字，都融入了更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元素。

展区中除了数十种青陶产品，还对“浸水”“闷青”“撵烟”等青陶烧制的传统核心技艺进行了注解。薛琦说，他用了16年的时间，才终于把这些传统烧制技艺的细节琢磨透。

四处学习 锤炼陶瓷技艺

在薛琦的记忆里，最早与青陶的交集来源于儿时村里的村民改造土坯房，因为要用到大量的砖头，村民们自发搭起了砖瓦窑来烧制青砖红瓦。“上世纪80年代时，村里都有砖窑，村民普遍开始烧制红砖。”薛琦记得，自己村子里的砖窑是少有能烧制青砖的，青砖烧制难度大，但却异常坚硬。”彼时，薛琦就深知那些历经千百年而屹立不倒的古建筑，都离不开这种看起来有些黑黢黢却又十分沉甸甸的家伙。

对传统烧制技艺的痴迷，大概就是那时开始的。“2008年，在一次和大学室友闲聊的时候，突然问到要不要学学老手艺，建个柴窑烧点印模(又叫娃娃模)和青陶看看。”或许是儿时的执念，又或许是骨子里对艺术的追求，薛琦和大学室友杜雪军一拍即合，两人先后前往西安、洛阳、巩义等地探寻传统陶器烧制技艺。

“我们还跑到曲阜，找到了一位窑厂烧制青砖的‘老把式’，请他来济宁帮我们建了座窑，还传授给我们了许多传统烧制技艺。”说到这，薛琦颇有感慨。“真正动手烧制起来时才发现，一块好青陶可没这么容易‘请出’窑。排潮孔开多大，窑内温度烧多高，‘老把式’一伸手探探



薛琦正在工坊内为青陶描金。

烟囱的烟，再闻闻味儿就了然于心，咱跟着有样学样却还是做不好。”

从2008年开始，薛琦按照一年一窑的节奏进行烧制，七八年的时间里几乎耗尽了家底，只烧制成功了一窑青陶，“不是火候掌握不好，就是湿度掌握不好，有时候又有些心急，为了能尽快出窑，觉得提提温度、降降湿度也没问题，但开窑一看，几百块青陶全是断裂的。”薛琦说。

守正创新 融入济宁元素

一次又一次的摸索中，薛琦逐渐掌握了从取土、晒土、浸水、和泥、制坯、小火排潮、大火烧制、撵烟、大小水闷青、精修打磨等足足二十三道工序。

后来，他又尝试着描金、刻绘等新的表现形式，陆续创作出近百款内容不同

的干泡台、壶承、杯承。早期推出的儒苑青陶“百家姓氏”伴手礼渐渐有了市场后，他又请来专家一起深挖百家姓的历史文化底蕴，整理收录了多达46万字的资料库，通过“科技+传统文化”的形式，让顾客可以一扫码就能了解到400家百家姓氏的历史渊源，从得姓始祖、历代名人、姓氏图腾、郡望堂号到人口数量和分布等相关史料，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儒苑青陶的文化价值。

“过去，古法烧制的青砖主要用到建筑上面，而现如今，通过青陶等产品可以融入到社会大众的生活当中，让这些传统烧制技艺可以继续传承下去。”薛琦说，未来他不仅要在青陶上融入更多济宁的历史文化元素，还要尝试创作更多样的青陶作品。“我也在不断探索烧制技艺，希望将历经千百年的烧制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新坛·大家讲

话『才、位、年』关系 观南北朝文士

南北朝时期，文才与仕宦之间的相互关联已颇为时人瞩目。文人在官场、文坛的位望也会影响时人对其具体文学作品的评价。

南北朝时期较早对文学、权位之关联进行系统论述者，当属卢思道《仰赠特进阳休之序》。其云：“夫士之在俗，所以腾声迈实，郁为时宗者，厥途有三焉，才也、位也、年也。才则弘道立言，师范雅俗；位则乘轩服冕，变代天工；年则貳膳杖朝，致养胶序。”在卢思道看来，“才”“位”“年”是俗世眼中成功者必备的三大途径：“才”是弘道

立言的文事能力，“位”是位高权重的政治能力，“年”则是年高德劭的道德影响力。三者若得其一，自可“腾声迈实，郁为时宗”。不过，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三者并非彼此孤立，“才”与“位”往往相辅相成，“年”则是前两者促成的结果。

“才”不因“年”“位”而贬损其独立价值，即使“年”促“位”卑，仍可能因“才”而产生不朽的影响。殷璠《河岳英灵集序》称：“知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可见，其着重剔除权位因素，凸显“才”“道”合一的编选标准，成为由“才”“位”“年”相结合的俗世价值观向“才”“道”“权”分离的文道观转变的时代信号。总之，“才”与“位”(或

“权”)之间具有广泛而密切的内在关联。若在文学、政治的交叉视域下考察，二者之间的关联命题则可归入文学与选官制度交互影响的范畴中。

对南北朝文士而言，他们或凭藉选官制度由布衣转为官员，或因政绩表现而升降迁转，其身份往往呈现出官僚、作家、学者、士林贤达、乡邦领袖等多重样态；这种复合型身份又使其文事活动、创作心态与其官场实践、政治心态高度叠合，他们以各级官员制度为纽带，聚集于朝堂、郎署、东宫、藩府、文馆、郡衙，进而掀起了超越汉晋的集群化、功能化、应制化、宗教化、美化的文化新风。

可以说，南北朝选官制度

承续汉晋旧制，又拓展新的制度功能，通过对世族政治、士格官习、文气风尚的渗透与耦合，形成了这一时期颇具特色的“选官-文学混合体”，并对后世文坛格局演进、文尚批判与转换、文论范畴增扩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选自曲阜师范大学孙宝教授所著《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运兴变》一书。该书提出“南北选官-文学混合体”的全新概念，运用历史语境还原与文学政治功能生成的相关理论，揭示了南北朝铨选制度、官署运作、官场生态、选官文化对文学的全面影响，从而使先秦两汉至明清制度文学化、文学制度化的研究范式、学术链条更为完善、贯通。)